

二十世紀名家詞述評

送堂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刘梦芙◎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名家词述评



刘梦芙◎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名家词述评 / 刘梦芙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396-2666-6

I. 二... II. 刘... III. 词(文学)—文学评论—中国—20 世纪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0984 号

二十世纪名家词述评

刘梦芙 著

责任编辑:温 涓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2.5

字 数:350,000

版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666-6

定 价:2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刘世南

对中国传统的诗、词要进行述评，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述评者应有丰厚的素养；（二）述评者应有创作的经验。

先谈第一点。所谓丰厚的素养，包括：

（1）融贯古今、取精用宏的通达思想：生活在二十一世纪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如果思想不能与时俱进，或者一味鄙弃传统文化，那他的文学观念一定也是狭隘而偏执的，不可能对二十世纪名家的词作获得正确的认识，进行正确的评价。

（2）文、史、哲的深厚根柢：当代的中青年学人，先天的缺陷就是根柢浅。你只要看他们的论著中的引文，断错句的、文义理解错误的、胡乱发挥的，简直触目皆是。我在拙著《在学术殿堂外》一书中，苦口婆心，几乎是垂涕泣而道之，总求他们踏踏实实做学问，不要“嘴尖皮厚腹中空”。

（3）对被述评的词作有深透理解：现在有些笺注或论析名家词作的，由于自己修养差，往往郢书燕说，既昧古典，更不明今典，只好生搬硬套西方文论的术语名词，蒙混读者。

以上这三点，是当今学人的通病，可是梦芙先生截然与之相反。

我与梦芙先生尚未谋面，神交则久。函牍往来，频颁佳什，论心恍若旧交。记得他初读《在学术殿堂外》后，特写札记几十页，和我讨论，充分表现出“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我也由此深深理解他的为人。南京大学董健先生曾对我说过，现在有些老先生，国学修养深，思想却较迂阔，不大理解时代思潮。梦芙先生不老，但国学修养深，特可贵的是能洞察时代思潮，阐扬人文精神，真正与时俱进。他所以关心二十世纪名家词，去年（2005年）又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百年名家诗词及其流变研究》，我以为正和他系心国运、追求民

主有关。

谈到文、史、哲的深厚根柢，就我见闻所及，在当今中青年学人中，梦芙先生是位列前茅的。我虽痴长他三十岁，却一向视为畏友，甚至认为是可与语的韩陵片石。这不是我阿私所好，只要看看他的诗、词创作，以及其他学术论著，便可知吾言不谬。读了本书的前言，更可了解他的家学渊源和师友启沃切磋之功，那么，他能有这样的学富功深，也就决非偶然了。

最后谈到对述评对象的深透理解，这既与梦芙先生在文、史、哲方面的学富功深有关，又和他的文学观念正确有关，更和他善于诗、词创作分不开。而和述评对象中某些名家的交游，就像钱谦益的《吾炙集》、冒襄的《同人集》一样，使他对有关名家的词作获得更为深透的理解。

以上是谈丰厚的素养，现在再谈第二点：创作的经验。

现、当代很多学人，空谈理论，不会创作，这是一种悖论。关于这一点，钱仲联、钱锺书、程千帆诸老早已谈过，梦芙先生在本书前言中也再次说明了。坦白说，我对那些所谓诗论家是不敢恭维的。哪有研究中国古典诗歌而读得既少（大多似懂非懂，甚或张冠李戴），又不会创作的呢？可要真正读懂又能创作谈何容易，没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行么？梦芙先生最可敬的恰在这里：诗学诗功，两擅其胜。蒙他屡屡邮示所作诗、词，每一盥诵，真是口齿生香。无怪乎他对吕碧城女士和钱仲联、饶宗颐诸老词作的分析，都能鞭辟入里、洞察深微了。

以上是谈第二点。

总之，根据以上所述，可以断定，梦芙先生是最适合作二十世纪名家词的述评的。

梦芙先生志趣在探讨二十世纪的传统诗词，我则研究清诗流派。其实我们除了进行艺术性的分析外，更注重的是追溯时代意识的接受、深化和运作的过程。正是这种关怀现实的情怀，使我们产生了这种学术研究的志趣。至于同为文学史上补空白，这也是秉承顾亭林先生的著书原则，概言之，即：前所未有，后不可无。

我自幼即喜读词，小学时从学校图书馆借得一本《历代名人词选》，雨窗夜读，神魂飞越，每如汤卿谋所言：“儿无所悲也，心自凄动

耳!”初中时,爱上了《饮水词》,和纳兰容若恍惚相契于无言,心灵常为之摇荡。

但是,虽极喜爱,所作却极少,原因是需按谱填词,不如诗之自由。我本以诗为余事,词则更只欣赏而不自作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只能让梦芙先生独擅胜场了。梦芙先生不仅善作,而且善论,茫茫禹甸,殆寡其俦。我渴望早日能读其大著,更愿其非空前绝后之作,极望来者亦能如梦芙先生之创作与理论并重。

是为序。

刘世南作于江西师大文学院,时年八十有二,

2006.1.23(夏历乙酉年十二月祭灶日)

[注]刘世南(1924—),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学者、诗人。有《清诗流派史》、《在学术殿堂外》、《清文选注》、《大螺居诗存》等多种著作。

前 言

(一)

在中国文学史上,古典诗歌与骈、散文是相对于小说、戏曲而言的雅文学,《诗经》、《楚辞》与唐诗,占有崇高的地位,宋元明清历代诗,亦属文学的正宗。诗歌中原初视为“小道”的词,经文人学士的不断加工,也走上雅化之路,从歌儿舞女口头演唱的俗曲逐渐衍变为脱离音乐而存在的书面文学,或者说从歌者之词成为词人之词、诗人之词乃至学人之词,由附庸蔚为大国。两宋是词的黄金时代,历元、明而衰靡,至清代词业中兴,词人之多、制作之丰、风格流派之繁皆超越元、明,抗衡两宋,已是学术界的共识。“诗词”往往合称,同属传统诗歌这一大范畴,创作理论上多有共通之处,实则词在体制、格律、修辞技法、审美意境诸方面皆迥异于诗,古今词家论辩甚详,词有其独立的艺术个性。当代汉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认为,词是传统文学中最精美的体式:“词之为物,合声文、形文、情文三者而为一。句之抑扬长短,音之清浊亢坠,调谱以之形成,有其定格,故音乐性亦最高,其他韵文,无可与比拟者。若其炼字琢句,六丁难致其工;被质纬文,七襄亦逊其采。清空之气,流转于字里行间;真挚之情,无害乎乱头粗服。句兼对偶,辞极绵丽,盖合骈散之职能,华夏文体演进,至此而臻极致焉。又况一调一体,少之十六字,多者二百四十文(《莺啼序》),增减摊破,不离其宗;勾勒腾挪,出人意表。用笔既提顿承转,结拍复水尽云生。或淡语而以浓句收,或艳情而以幽景结。忽张忽弛,愈朴愈真,曲终人散,江上峰青,尤情文之不可及者也。……词中三昧,尤在托体高浑,眇尽比兴。试摭寄托于片言,譬投水乳于一甌。作者诚能意内而言外,读者自可据显以知幽。玉葱层剥,微窥内蕴之心;珠帘半卷,且觅归来之燕。空中传恨,更谁定厥是非;表里相宣,聊假类以自达。渊乎词旨,归趣罕求,词体之尊,理原于此,文辞之

变,斯其极矣。”^①

饶先生对词的艺术特点,阐释和总结得精到透彻,融合了浙西、常州两大词学宗派的审美观念。词富有声韵格律的音乐美、词采意象的图画美和参差中寓整齐、回环中有对应的章句结构美,词人多运用比兴、象征手法,在丰富多彩的体式中抒发或寄托芬馨悱恻的情思,构成含蓄幽深的意境,确乎是中国韵文美的极致。历代词虽以“婉约”即纤丽阴柔之美为“本色”、“正宗”,但并未排除雄健豪放的阳刚之美,只是反对粗直鄙俚和过于议论化、散文化的风格,许多大词人的创作往往刚柔兼济,尽量保持词体的特色。词固然不能取代古、近体诗,但凭其独具的艺术魅力赢得无数读者的喜爱,千百词家为此殚精竭智,作品汗牛充栋。因此对词人词作的历史考证、音律研究和思想艺术方面的理论探讨,成为有别于诗,即具有独立和自足学术价值的专门之学。

有清一代朴学盛行,词学研究成果斐然,万树《词律》、戈载《词林正韵》分别为格律、音韵方面的代表作,各种词话沉沉夥颐,学林交赞,词体弥尊。到了二十世纪,对敦煌经卷、甲骨文字的研究被称为历史、考古方面的显学,而文学学术界对《红楼梦》和词学的研究,同样有显学之名,属于国际性的人文学科。在清末民初,王鹏运、朱祖谋从事历代词的版本校勘并汇刻,郑文焯精研词的音律,况周颐、王国维建构词的创作与审美理论,皆为后人树立楷范。民国间词学家风从云涌、斗耀星繁:冒广生、夏敬观、陈匪石、吴梅、刘毓盘、刘永济、王易、汪东、蔡嵩云、顾随、薛砺若、夏承焘、俞平伯、唐圭璋、龙榆生、赵尊岳、詹安泰、缪钺、宛敏灏、胡云翼等学者纷纷著书立说,阵容鼎盛。龙榆生三十年代初在上海首创《词学季刊》,招致大批学者,确立词学的学科地位,厥功甚伟;夏承焘编写唐宋词人系列年谱,考证白石词的音律;唐圭璋编辑《全宋词》与历代词话,都是卓越的贡献。在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虽因极“左”思潮的影响,词学陷入低谷,但拨乱反正后迅速复苏,老一辈词学家发挥余热:施蛰存先生创办《词学》,继龙榆生中断之业;沈轶刘、夏承焘、俞平伯、唐圭璋、缪钺、宛敏灏、钱仲联、吴世昌、万云骏、吴则虞、刘逸生、朱庸斋、吴熊和的词学旧稿或新著接连出版,并培育出大批弟子;港台及海外

学者如饶宗颐、罗忼烈、叶嘉莹、林玫仪的词学论著也在大陆印行。继《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出版之后,编纂《全明词》、《全清词》,撰写历朝词的断代史,同时举办多次国际词学研讨会,论文在各种期刊发表,中青年学者的专著也不断问世。以上仅仅是极为简略的叙述,已足见词学的兴旺,大可与传统诗学分庭抗礼。

近百年来的词学,还只是方兴未艾的新学科,成果虽然可观,毕竟不能与诗学研究的丰厚积累相比。例如对词史源流、作家作品的探讨,只是集中于唐五代和两宋,金元明清各代词则远未大规模开发。词论方面的研究则着力于宋、清,于二十世纪仅重点阐释、笺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旁及况周颐、梁启超的理论。有几部词论谈到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的学术贡献^②,而对许多词学家理论体系的研究,付诸阙如。老一辈词学家大多继承古代士人知行合一的传统,是学人而兼词人,其审美观念非但见诸理论,更融贯于创作实践之中,学术著作之外还有词集,从陈匪石、吴梅、王易、刘永济、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缪钺、钱仲联、吴世昌到饶宗颐、罗忼烈、叶嘉莹,几代人无不如此。但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文言文与旧体诗,白话文与新诗迅速占领文坛,新中国建立后更是政治运动频繁,严厉批判传统文化,现代人创作的旧体诗和词遂弃如敝屣。新文化旗手陈独秀、鲁迅、李大钊,追随者沈尹默、俞平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以及新文学家郭沫若、郁达夫、老舍、叶圣陶、朱自清,明明都有旧体诗,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皆不予论介;对词学家们数量丰厚、质量精美的词作,学术界也视同无睹。“文革”后词学研究恢复正常,而割裂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和鄙夷旧体文学的话语霸权依然存在,建国以来培养的新一代学人,大多重理论而轻创作。对于古典诗歌包括词的研究,虽然建构了不少理论,但极少联系近百年间已经存在而且还在不断产生的诗词作品实际,所谓理论也往往成为象牙塔里的空谈,起不到指导、推动创作实践的作用。新一代学者不关注活生生的现当代诗词,诗词爱好者宁可读古典,也很少光顾抽象玄虚的新式理论;而打破一切规律、追求无限自由的新诗作者更是远离传统,以奇异、“西化”为目标,这种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局面迄今未曾改变。

有些学者喜欢下臆测式的结论,宣告传统诗词及相关的诗话词论到近代已经“终结”,王国维或梁启超是“终结”的代表^③,似乎此后便是新诗、新理论的一统天下,传统与现世毫无关系,只是历史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了。许多高论经不住大量事实的检验:上述一系列词学家兼词人大多生于王国维、梁启超之后,不但词学研究远较王、梁丰富、全面,而且词作境界之广阔、风格之多彩也非两家所及。夏承焘先生被尊为“当代词宗”,是就其创作与学术同样杰出而言的;缪钺、龙榆生、詹安泰、钱仲联、饶宗颐诸先生之词,既能开拓古人未有的新境,学术上也融化新知、使用现代科学方法,但始终未曾斩断传统的血脉。“词坛点将录”这种旧式体例,为钱仲联先生所继承运用;饶宗颐先生的词论,多用典雅的文言;吴世昌先生的《词林新话》,体式同样不离传统。至于钱锺书先生喜作旧体诗,融贯中西、文辞尔雅的《谈艺录》为诗话体,更为学界熟知。人文学术与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不同于政治、经济体制与科技,后者创新每以革旧为代价,前者则新旧交融,相生不息,形式之旧无妨思想意识之新。历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过去与现在及将来有内在的联系,旧可生新,新中有旧,属于精神文明的诗词,是中华文学的精华,尤能表现这一历史特点。词学家们的词作,反映时代风云,关注国计民生,充分显示知识人士的品格和心灵之美,是传统与现代、固有的民族精神与自由、民主等新人文理念浑凝一体的结晶,也是光华熠熠的雅文学艺术珍品。如果我们研究、论述近百年词学史,就不可能以王国维为终极,不应该回避多位词学家和大量词人的词作。理论只有紧密切合创作实际,才能产生永不衰竭的生命力。“五四”的精神当然需要继承,但如果仍旧以偏激的心态鄙弃诗词,则既不“民主”,更谈不上“科学”。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传统诗词在创作方面已开始复兴,诗词社团遍布海内。《中华诗词》、《当代诗词》、《诗词》报成为公开发行的刊物,诗词研讨会与各种赛事频频开展,诗词爱好者据称不下百万,从老年到中青年,都有成就突出的作手,这一实存并在发展的社会文化现象,亟需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而九十年代初掀起的“文化热”、“国学热”,也促使人们反思历史、正视传统,质疑线性

进化论和分裂对抗式的二元思维,深入探索文化学术古今新旧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同时广泛汲取外来思想文化的精华,为建设多元并存、和谐健康的新世纪中华文明而努力。笔者初入学界,只是一名普通的学员,个人志趣在于探讨二十世纪的传统诗词,以上所述,即为治学的基本理念和事实根据。

(二)

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故乡在皖鄂交界的大别山深处,是偏僻而又贫困的农村,祖上历代以耕读传家。父亲讳凤梧(1894—1974),民国间毕业于安徽大学文学院,曾任安徽省教育厅视导及省城(安庆)多所高级中学国文教师。1949年退休归里,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学造诣深厚,诗词创作成就颇高,遗作多篇,已被收入各种现当代诗词选。我在童年时期,父亲就教读唐诗、古文,幼小的心灵饱受古典文学甘泉的滋润。“文革”祸起,家藏典籍付之一炬,父亲被指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实则家父是诗人、教师,属政府统战的民主人士,而非专事研究的学者,当时口号如此),在“打倒”之列。我读初中未毕业就被迫回乡,参加艰苦的体力劳动。在无书可读、心情极端苦闷之时,开始习作旧体诗词聊为消遣,承父亲精心批改、严格要求,得以通晓格律声韵、章句技法,打下一定的基础。粉碎“四人帮”后,我被聘为中学教师,自学大学文科,同时购买大批诗学、词学书籍,潜心研读,重寻儿时的乐趣。恰逢八十年代初诗词复兴,报刊纷出,因以习作投寄,时有发表。但深感环境闭塞,学识浅陋,便以信函的方式向海内外知名的前辈专家学者求教,并利用假期外出参加各种诗词活动和学术研讨会。近二十余年来,转益多师,缪钺、施蛰存、宛敏灏、钱仲联、胡国瑞、周振甫、程千帆、张珍怀、饶宗颐、罗忼烈、霍松林、刘世南、彭靖、李汝伦诸先生都曾寄赠其学术著作或诗词集,予我以谆谆教诲;而中央文史研究馆孔凡章先生在诗词创作方面指导尤多,批改极严。九十年代间我参加一系列全国诗词大赛,获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共二十余次,因而被中华诗词社借调至北京,任责任编辑;期满后被推荐调入安徽省社科院,从事近现代诗词的专业研究——这与诸多前辈的关爱和栽培是

分不开的。

我早年学诗,以七律为主,中年渐学五、七言古体,有几年时间专力填词,以百字左右长调居多。除向老辈词家请教外,与中青年词人王蛰堪(天津)、熊盛元(南昌)、魏新河(陕西)、段晓华(南昌)、周燕婷(广州)时有唱酬,词札往还,积稿数百首。填词需讲究声律、辞采,慢词中如《齐天乐》、《霜叶飞》、《木兰花慢》诸调,句中两仄连用须分去上,四声的辨析更细入毫芒,每作一词皆颇费心思,炼意兼炼句、炼字,几易其稿。写成后抄寄师友,得复信指出疵误,又再作修改。这纯是一种业余爱好,无任何功利可言,从未考虑到以后可从事学术研究,只是在习作中寻求精神愉悦而已。1991年秋,词友王蛰堪在天津发起并成立鸿雪社,海内外中青年陆续参加者三十余人,聘请沈轶刘、缪钺、孔凡章、张珍怀、周退密、陈机峰、周汝昌诸老为导师,定期出题为社课,完成后分寄导师评出等次。记得第二期课题为《水龙吟·鸿雪社成立感赋》,拙作列为第一,缪钺先生评为“深挚”,给我以极大的鼓舞。此外,沈轶刘先生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繁霜榭词札》称许拙词;钱仲联先生在通信中点评我几首诗词,誉为佳作;胡国瑞、周振甫、周退密、陈机峰、霍松林、陈贻焮、吴调公、罗忼烈、叶嘉莹、吴孟复、羊春秋、李汝伦、周笃文、徐培均、喻蘅、常国武、陈永正诸先生于拙作皆有评论,都使我感念不已。虽蒙赏识,但我深知与诸多前辈大家相较,无论是学养、见识还是工力、才华,都难以望其项背。前辈只是看到后生有这方面的爱好,遂乐于扶持,倘因此而生骄傲之心,那是不能长进的。

1992年春,施蛰存先生来函,嘱我为安徽已故女词人丁宁撰文,可发表于《词学》,才使我开始意识到可以尝试学术研究。此前在1987年,我完成的大学函授本科毕业论文为《综论稼轩词的艺术成就》,被安徽师大中文系办公室编入《毕业论文选》,余恕诚老师曾来函鼓励多写,但因中学教务冗繁,惮于论文写作的难度,不似诗词之轻车熟路,故未曾着笔。经施蛰存先生的督促,我与曾撰有《丁宁年谱》的刘夜烽先生联系,获得支持并寄来资料,于是写出《怀枫词人丁宁及其词》一文,寄与施先生,再反复通函,修改定稿后载于《词学》第十一辑(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11月版),1996年获安徽省

第三届优秀社科成果奖。同时期又写《综论诗词之继承与发展》一文两万余言,发表于《安徽吟坛》第5期,缪钺先生评为“针砭时弊,准确透彻;正面阐述,深中肯綮,确是一篇力作,读后有深获我心之感”。此后我的兴趣便由作诗填词逐步转向评诗论词,自1993年到九十年代末,撰写十四五万字的《冷翠轩词话》(今易名为《近百年名家词话》)和几篇万言以上的近现代名家词专论,分别发表于《中国韵文学刊》、《晋阳学刊》、《中华诗词》、广州《诗词》报、香港《大公报·艺林》及多种内部刊印的省级诗词学会期刊。1999年秋调入省社科院文学所后,有充分的写作时间,我认为近百年诗词目前很少有人研究,在现当代文学史、学术史上是一片巨大的空白,因而以此为探讨的重点,试图开荒拓壤。近几年来,陆续写出上百万字的文章,发表于《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一二三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语言文化学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华学》、《中国诗学》、《中国诗歌研究》、《博览群书》、《中华读书报》及多种高校学报,其中《二钱与〈入境庐诗〉》一文被《新华文摘》转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虽取得初步成果,但距离希冀中的目标还十分遥远。2005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百年名家诗词及其流变研究》,有幸获得批准,将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完成几十万字的专著,需要下艰苦的工夫。总之,我个人研治诗词的路子,应该说是传统的,即从创作入手,读写结合,再转入理论。在诗词审美观念方面,受老一辈学者的影响较多,不愿意盲目追逐时尚,以标新立异。由于有三十余年的诗词写作体验,庶几评论风格流派、律法词章等艺术性时,不至于空谈无根或隔靴搔痒;不足之处是偏重于直观感悟,流于印象式批评,缺乏形而上的思考,未曾建构逻辑性的诗学、词学体系^④。因此需要不断补读大量哲学、史学、美学、语言学乃至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书籍,借鉴并吸收一些新思想、新方法,努力形成融贯古今、扎实严谨的学术风格,为阐发二十世纪诗词之潜德幽光而贡献绵薄。

(三)

在阅读、评论近百年诗词的同时,我还做过一些资料编选(包括作品和词论)的工作。在浩如烟海的诗词中选取精品,是另一种形

式的鉴别批评,《诗经》、《昭明文选》、《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及近人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等是流传不衰的选本,体现了选家的眼光和标准。1997年至1998年,我受中国新闻学院教授、中华诗词学会秘书长周笃文先生的委托,编辑《世界汉诗大典·近现代卷》,抄选诗词五千余首约八十万字,交稿后周先生称为“质量极高”,但迄今尚未出版。1999年至2002年,我编成《百年词选》,收词家七百余,词七千余首,每家词前有作者小传,词后附大量集评,共一百多万字。此书请饶宗颐先生题签,钱仲联、马祖熙、陈机峰、霍松林、叶嘉莹、周笃文诸先生作序(钱序已发表于2000年首期《文学遗产》),钱先生谓“以词人而选词,知之深而选之也善”;霍先生说“梦芙幼承家学,既工倚声,复精品鉴”,这是愧不敢当的。此书完工后交稿浙江古籍出版社,该社由于资金匮乏,搁置未出。这部《二十世纪名家词述评》,正是在大量搜集、阅读、汇编文献的基础上逐步写成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部分:

一、百年词综论

文中叙述百年词发展概况,阐明百年词的重大成就,包括词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多种流派以及百年词的突出特色——词人学者化和词作典雅化。

二、名家词专论

这是一组论文,篇幅或长达两三万言,或仅五六千字,分别论述吕碧城、丁宁、夏承焘、钱仲联、饶宗颐、霍松林等现当代名家之词(另有几篇论近代词人蒋春霖、周星誉、文廷式词的文稿,编入《近现代诗词论丛》,不在本书之内)。文章或是较全面的“综论”,或着重阐述词作的某一方面,或在某家词作之外又论其词学,所论词家在百年词坛有其代表性。诸文已分别发表于《安徽省文学论文集》、《词学》、《中华诗词》、《华学》及数种高校学报,在文后一一注明。

三、近百年名家词话

用传统的词话体式,表述用简易文言,重点评论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后约九十年间的词人词作(1911—2000)。人物主要是学者、词学专家,其他则为出版社或报刊编辑、书画家、医生、中学教师、民主人士等等,属于社会各阶层的高级知识分子。词话一般先概括介绍词

人履历、词作的师法渊源、艺术风格及词学理论观点,再选取若干代表作加以阐释印证,力图宏观把握与微观鉴赏相结合,要言不烦。篇幅较长者约三千字,短则不足千言。因写作时资料所限,许多卓有成就的词家未及评述,有待增补。(请参看《词话》序言及所附注释)

四、“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

诗(词)坛点将录也属于传统诗学批评体式,为清代诗人舒位首创。清末至民国间,朱祖谋、柳亚子、汪辟疆、范镛等人续为之,皆以小说《水浒》一百单八将分拟诗坛或词苑名家,品评高下,有似钟嵘《诗品》,而文笔冷隽幽默,颇受当时读者的喜爱。当代学者钱仲联先生更集《点将录》之大成,所作共六篇,论及唐宋元明清至现当代诗人、词人五百数十家,蔚为巨观。拙作承此体例,选评“五四”以来老中青数代词人,约四万余言,曾发表于蒋寅、张伯伟先生主编《中国诗学》第十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并登载于互联网。饶宗颐先生读后来函,谓“《点将录》多警策见解,发人深省”;霍松林先生信中云“治百年词多年,盱衡全局,目光如炬,点将皆确切不易。……行文典雅、华赡、明畅、洗炼,卓见叠出,胜义络绎,褒贬皆惬心贵当”,未免称誉过度,只能视为对我的鞭策。兹收入本书,为最后一部分,但非定稿,待学力有进后,还将仔细修改。

本书的论述文体和语言方式未能统一,也缺乏严密的建构,只是将十多年的“前期成果”汇编一集,按文章类别和词人生卒年先后排列而已。但所有文稿都是围绕二十世纪词人词作这一中心来撰写的,其中融贯了个人作词的体验和读词的审美观念,或不同于拼盘杂凑,识者鉴之。

关于本书,还需作以下说明:

1. 二十世纪一百年,按通行的史学观念,应包括近代(清末民初,1901—1919)、现代(民国期间,“五四”后至1949年)、当代(新中国成立后至世纪末,1950—2000)。近代词坛名家如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文廷式、黄人、王国维等,学术界已有人研究,但不少成名于清末而享年较高的词人到民国间仍在坚持创作(如沈曾植、夏敬观、张尔田、杨圻、金天羽、叶恭绰等等),历史实在难以截然

分段。本书所评述者绝大多数为“五四”以后著名词人,其中许多名家到八九十年代还不断作词。这一大批现当代词人,学术界未有专题研究,因此本书有初步填补空白的作用。

2. 书名《二十世纪名家词述评》,所谓“名家”不等于“名人”,是特指在词的创作方面确有成就,为词坛所公认者。有的词学研究者出版了学术著作,但不擅填词或作词水平一般,故不入“名家”之伍。名家的造诣也非一致,有杰出的大家(如吕碧城、夏承焘、詹安泰、沈祖棻、饶宗颐等)和泛称的名家之别(如宋词中苏轼、周邦彦、辛弃疾为大家,比较而言,秦观、贺铸、周密、王沂孙、张炎只能称名家,姜夔、吴文英则介乎大家与名家之间)。若干词人因时代、地域、境遇所限,生前作品未及刊刻传播,影响未能广远,但其成就实能达到名家的高度,故同样予以阐发。近百年多有名人颇喜词章,或为政坛元老,或为军界将帅,其功业彪炳青史,词仅余事为之,致力并不在此,笔者不敢妄加评论。因此本书涉及的对象为文士之词、学者之词,即人文学科乃至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的作品,以保持词之为词的特色。述评时尽量选取思想内涵与艺术风格完美统一的精品,注重词中的时代气息和意境的创新,摒除叫嚣鄙俚或违律失韵的所谓“解放体”、“改革体”。在风格流派上兼收并蓄,或典雅、或清新、或婉丽、或沉郁、或雄放,凡能自成一家、不失词体之美者,皆在论列。

3. 研究近百年词与旧体诗,存在很多困难。首先是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乃至新中国成立后极“左”思潮的影响,传统诗词被排斥在文学主流之外,必须在观念上澄清认识的误区,重估诗词的价值。其次是由于叠遭兵火与政治动乱,文献资料大量散失乃至被销毁,许多词人专集仅存孤本或手稿,或者词随人歿,以个人之微力,搜集极难。现当代诗词不似古代诗词那样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供借鉴,尚处于极少数人试行开垦的阶段,费力多而收效不大。再次是研究的对象为文人学士,作品中多用典故并寄寓本事(所谓“古典”与“今典”),且填词又常用比兴、象喻,曲折幽微,若非深察作者生平及所处时世,甚难明其旨归。其中不少词家是著述等身的大学者,知识宏博,思想复杂,必需尽量通读其词集之外的各种著作,方能有全面的了解,就词论词是远远不够的。此外,词作为传统文学体裁,首重继

承,研究现当代词还需上溯千年词史,考察词艺的渊源流变、宗法途径。词人往往兼擅旧体诗,同时也受新文学、新思潮的影响,都需要加以探讨,进行比较。上述种种困难,实非学陋识卑如我者所能完全克服,只是尽其微力,勉为拓荒者而已,举鼎绝膺,难辞其诮。这里殷切寄望于学术界对二十世纪词产生兴趣的同道,协力耕耘这一片莽原,方能有真正的收获。

按个人设想,还拟继续搜罗材料,编著二十世纪词史与词学批评史,要撰写多篇大家、名家词的专论,并编一部《百年词精选注评》,这一系列计划只有俟诸来日,逐步完成了。

本书由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支持出版,作为中心编辑的诗学丛书之一。中心主持人余恕诚教授是我参加本科函授时的老师,对我个人的学业倍加关注,在此谨致深切的谢意。此外,今年九十高龄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为拙著题写书名;八十多岁的刘世南教授为拙著作序;本书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印行,我院文学所所长钱念孙先生热情推荐;出版社副总编温媛女士亲任责编,从版式设计到编校,殊劳心力。在图书出版走向市场经济的今天,纯学术性的著作问世极为不易,离不开多方面的支持,我十分感激,一并致谢。而因学识所限,书中难免错谬,敬希读者指正。

刘梦芙

2006 年元月

【附注】

①饶宗颐:《词学理论综考序》,载《选堂诗词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13页。

②参见下列诸书: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巴蜀书社1993年版;施议对《今词达变》,澳门大学1999年版;朱惠国《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此外,《词学》中有关夏承焘、唐圭璋的纪念专辑也曾总结两家的词学功绩。

③严迪昌《清词史》、朱惠国《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杨柏岭《晚清民初词学思想建构》等著作中皆有类似说法,或谓晚清四大词人只是“暮色初起时候